

清代臺灣寺廟僧人牌位的史料意義

——以宜蘭昭應宮為中心

闕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

摘 要

臺灣自清代以降，宮廟之數量較之佛寺約為三倍，加之民間信仰寺廟因佛道混合，住持往往由僧侶擔任者多，從鄭喜夫之〈清代在臺僧人錄（初稿）〉所收錄281位僧人來看，絕大部分皆住持宮廟而非佛寺。因此，要研究清代臺灣佛教，非宮廟僧侶著手不可，而宮廟所保存者僧人牌位，就成為解開清代臺灣佛教發展的一把鎖鑰。

本文以宜蘭市昭應宮所發現的清代兩方僧侶牌位「黃檗流芳」、「南院衍派」為例，分析其宗派傳承、歷史意義及史料價值。

關鍵詞：牌位、宮廟、昭應宮、黃檗、南院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emorial Tablets of Monks in *Qing* Dynasty Temples in Taiwan -- Centered on *Zhaoying* Temple (昭應宮) in *Yilan*

Cheng-tsung K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e number of Taoist temples in Taiwan was about three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because of the mixtur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he temples of folk beliefs, the abbot was often a monk. From the 281 monks recorded in *Zheng Xifu's* (鄭喜夫) “Record of Monks in Taiw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preliminary draft)”, most of them were living in temples rather than Buddhist monasteri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tudy Taiwan Buddhism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monks in the Taoist temples, and the monk tablets kept in the Taoist temples have become a key to unlock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Buddhism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two monastic tablets found in *Zhaoying*

Temple (昭應宮), *Yilan City*, from the *Qing Dynasty*, namely, ‘*Huang Bei Liu Fang*’ (黃檗流芳) and ‘*Nan Yuan Yan Pai*’ (南院衍派), as examples, and analyze their sect succession,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Keywords: Memorial Tablet, the temples of folk beliefs, *Zhaoying Temple* (昭應宮), *Huang Bei* (黃檗), *Nan Yuan* (南院)

目 次

一、前言

二、昭應宮歷史與人物

(一) 創建歷史

(二) 相關人物

(三) 從「天后宮」改稱「昭應宮」

三、昭應宮住持僧聘任及法燈

(一) 香燈資與僧人

(二) 「黃蘗流芳」牌位

(三) 南院衍派

四、結語

一、前言*

荷西（A.D. 1624-1662）、明鄭（A.D. 1662-1683）、清代（A.D. 1683-1895），臺灣作為漢人移民的初始之地，移民族群結構，以從事勞力、農業、漁業為主。這樣的移民族群牽動了信仰的內容。

明清時代華人的宗教信仰為三教合一、佛道不分，無論民廟或官寺，在聘請住持時，僧侶通常會成為首選。因此，僧侶進駐宮廟在兩岸皆是常態。

臺灣自清代以降，宮廟之數量較之佛寺約為三倍，加之民間信仰，寺廟因而佛道混合，住持往往由僧侶擔任者多，從鄭喜夫之〈清代在臺僧人錄（初稿）〉¹所見，共收錄僧人281位，絕大部分皆住持宮廟而非佛寺。因此，要研究清代臺灣佛教，非從宮廟僧侶著手不可，而宮廟所保存者或為牌位或為墓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以宜蘭市昭應宮所發現的清代兩方僧侶牌位「黃檗流芳」、「南院衍派」為例，分析其宗派傳承、歷史意義及史料價值。

二、昭應宮歷史與人物

（一）創建歷史

宜蘭市昭應宮為宜蘭地區最早之媽祖廟，嘉慶13年（A.D.

* 感謝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碩士生鍾旻融提供圖片及資料。本文發表於2022年9月4日，由圓光禪寺暨圓光佛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三屆臺灣佛教論壇」。

¹ 鄭喜夫，〈清代在臺僧人錄（初稿）〉，《臺灣文獻》季刊第41卷第2期（1990年6月），頁111-153。

1808) 由居民合建，當地人稱為「媽祖宮」。史載：

蘭未歸化時，初無神廟。因嘉慶十二年秋，前知府楊廷理會勦洋匪入山，見居民多病，始為請關帝、天后、觀音諸神像，以十三年夏迎入三結街奉祀。時居民踴躍鳩建廟宇，即以帝君、觀音附祀於天后宮。²

從上所知，嘉慶13年宜蘭天后宮因知府楊廷理（A.D.1847-1813）「勦洋匪入山，見居民多病」所建，初名天后宮，同時以「帝君、觀音附祀」。天后宮的建設及奉祀情況：

天后宮，在廳治南，東向。嘉慶十二年，居民合建。右龍亭，兩翼廊直達外門，護以木柵。……一在廳署大堂之右，東向，前後三楹。嘉慶二十二年，官民合建，左奉火神，右奉藥王。³

除了關聖帝君與觀音為陪祀外，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還有提及「龍亭」安置皇帝萬歲牌，嘉慶22年（A.D.1817）重建後還奉祀火神及藥王，護通判范邦幹（生卒年不詳）額曰「瀛海慈航」；通判高大墉（生卒年不詳）題額曰「祥凝福海」；道光10年（A.D.1830），署通判李廷璧（生卒年不詳）贈額「寰海尊親」，有柱聯曰：「救民於水，配德於天」。⁴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明確記載「嘉慶十三年，居民合建」，與柯培元《噶瑪蘭志略》的「嘉慶十二年，居民合建」，有一年

²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7〈祀典志·附考〉，《臺灣文獻叢刊》第92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60。

³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7〈祠廟志〉，頁61-62。

⁴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3中〈祀典·蘭中祠宇〉，《臺灣文獻叢刊》第160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118。

差距，與前述「嘉慶十二年秋」，楊廷理「始為請關帝、天后、觀音諸神像」，到了嘉慶13年夏「迎入三結街奉祀」又吻合，故可判知，昭應宮始建於嘉慶13年。初建時為「居民合建」，至嘉慶22年改為「官民合建」，故最晚至1817年可知官方已介入昭應宮建設。

(二) 相關人物

從現今昭應宮供奉清代楊廷理（A.D.1747-1813）、翟淦（A.D.?-1817）、陳蒸（生卒年不詳）「三大老」的木像看，此三人不僅對宜蘭地區開發有顯著貢獻外，對昭應宮之建設也具有一定之護持。

1. 楊廷理（A.D. 1747-1813）

楊廷理，字雙梧，廣西馬平人。「以拔貢生初知侯官縣，歷陞至臺灣海防同知」。乾隆51年（A.D. 1786）冬11月，「彰化林爽文起事，知縣孫景燧遇害，全臺震動，乃攝府篆」；乾隆52年10月，與福康安「克彰化，廷理率義勇從，三戰三捷，疏通中路」，降林爽文，「臺灣平」；乾隆53年（A.D. 1788）春，「署臺灣道」；乾隆60（A.D. 1795）年，「以在侯官任內虧欠庫款，謫戍伊犁」；嘉慶8年（A.D. 1803）「赦還」；嘉慶11年，「捐復知府，分發福建」；⁵ 嘉慶12年，「又任臺灣府」，因蔡牽（A.D. 1761-1809）騷擾海上，疊犯臺灣。蔡牽部將朱潰（A.D. 1749-1808）流竄蘇澳。7月，楊廷理率兵北上，與王得祿會攻，朱潰大敗而去。後楊廷理「巡視蛤仔難，謀

⁵ 連橫，《臺灣通史》卷31〈列傳三·楊廷理列傳〉，《臺灣文獻叢刊》第128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835。

開設」，朝廷以「地在險遠，民番雜處，慮有變，不許」。嘉慶15年（A.D. 1810）4月，「總督方維甸巡臺灣，次艋舺，蛤仔難民番皆請收入版圖」，朝廷命楊廷理「偕巡檢胡桂往勘之」、「乃將籌辦情形，條陳大府」，經交「臺灣道議覆」後，嘉慶17年7月，「設噶瑪蘭廳」，楊廷理任噶瑪蘭首任「通判」。同年12月，「調建寧知府」。⁶ 接續楊廷理為噶瑪蘭第二任通判者為翟淦。

2. 翟淦（A.D. ?-1817）

翟淦，字榆園，山東淄川人，援例得同知。嘉慶17年（A.D. 1812）噶瑪蘭初設廳官，翟淦因「大吏廉其能，借補通判」。翟淦履任後，「上自城池、壇壝、衙署、倉庫，下至兵房、監獄，彙作十七案工程，先行整頓，次第改觀」，雖鼓勵漢人開發蘭地，仍不忘消彌原漢衝突，「履勘三籍疆界，就中加留餘埔酌給化番」，並將「尚有未墾荒埔四千餘甲，限年報墾，上下地畝，不能一律，為之酌定科則，公私稱便」。翟淦任通判前後五年，「以勞成疾」，嘉慶22年（A.D. 1817）夏，「歿於頭圍公廨」。⁷

接續翟淦出任為噶瑪蘭第三任通判者為陳蒸，嘉慶22年7月27日升臺灣府撫民理番海防糧捕通判（噶瑪蘭廳通判）。

3. 陳蒸（生卒年不詳）

陳蒸，雲南籍浙江人，由進士補鳳山縣知縣。嘉慶22年7月署噶瑪蘭廳通判。陳蒸「承楊、翟二公之後，值地方草創之初，

⁶ 連橫1962，頁836。

⁷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0〈宦績志（附幕賓）〉，頁87。

惜士愛民，不名一錢；蘭人德之。」⁸ 陳蒸在位僅一年，嘉慶23年8月，由高大鏞（生卒年不詳）借補噶瑪蘭廳通判。⁹

（三）從「天后宮」改稱「昭應宮」

昭應宮初建時稱「天后宮」、「媽祖宮」，何時改稱昭應宮，時人研究指出：

清朝治臺官吏鑑察到媽祖信仰普及臺灣民間，而且為臺民生活主要的慰藉，因此朝廷為了順應臺民的心理需求，特別在臺灣地區頒行一政策，即凡是廳治所在地的媽祖廟，一律撥官帑敕建。……嘉慶17年（A.D. 1812），噶瑪蘭廳設立，委辦知府楊廷理權攝通判，援例奏請朝廷，撥下一筆公款給當時廳治（即今宜蘭市）的媽祖廟，即本廟，並賜「敕建昭應宮」一匾額，從此本廟成為官建象徵的媽祖廟。¹⁰

上文似乎暗指嘉慶17年楊廷理時「昭應宮」之名已隨著官帑敕建而確立，此說法頗待商榷。據昭應宮文物史料顯示，「昭應宮」之名出現應在道光14年（A.D. 1834），分述如下。前述「道光十四年改西向，規模較為宏敞」，時任噶瑪蘭通判之全卜年（A.D. 1780-1848）特紀文表之。¹¹ 全卜年，山西平陸人。由進士惠安知縣陞

⁸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0〈宦績志（附幕賓）〉，頁88。

⁹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8〈職官志·文秩·噶瑪蘭通判〉，頁70。

¹⁰ 游謙、施芳瓏著，《宜蘭縣民間信仰》（宜蘭縣政府，2003年），頁291。

¹¹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8〈雜識下·駢體·天后宮上梁文 全卜年〉，頁387。全文如下：「維國家崇報神功，海波效順；維節屋仰懷后德，廟貌更新。欣相宅而移宮，就望衡而對宇。鴻基視昔，弼我不丕；駿烈流今，思予

補，道光11年（A.D. 1831）12月初7日任噶瑪蘭通判；其後「陞臺防同知，以知府用」。¹²

道光14年的改建可說是重建，從原本現址對面拆遷，原面海東向改為背海西向。從今昭應宮之楹聯內容來印證，正門及邊門共有三副對聯，均以「昭應」二字為首，正門石柱楹聯題有「昭坤儀以配天派分湄島；應坎位而稱后福庇蘭城」。¹³一般寺廟中門與其楹聯首題，皆是代表寺廟落成之完工時間。

昭應宮遷建落成後，全卜年還有捐贈一對石柱「海不揚波萬國梯航歸帝版，民皆安堵一方樂利仰神功」，鐫刻於前殿「後付柱」上，並有落款「古虞全卜年敬書」、「道光乙未首夏」（道光15年，A.D. 1835），¹⁴因而可推知，道光15年為昭應宮遷建落成之年，亦是從「天后宮」改稱「昭應宮」之時。

三、昭應宮住持僧聘任及法燈

（一）香燈資¹⁵與僧人

贊贊。百州里安瀾平浪，普濟慈航；廿四秋闢地聚人，宏昭化宇。雖雲波謫詭，增華一聽於後圖；而虹彩互連，太樸已恢乎前制。屬銀河之案戶，架玉殿之飛梁。利計鶯遷，允宜美輪而美奐；鳴隨蛙梵，安問屬官而屬私。並告匠材，欣余郎偉。」。

¹²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2中〈職官·官秩·噶瑪蘭通判〉，頁58。

¹³ 2019年4月17日田調抄錄。

¹⁴ 鍾旻融，〈宜蘭昭應宮發展歷史之若干考証—從地方流傳的三則傳說談起〉，未刊稿。

¹⁵ 「香燈資」為供養寺廟之費用，有銀兩、田租等，如《新竹縣制度考》載：「臺北縣新莊渡夫林發官、烏獅嫂每年應納城隍廟香燈資十二兩」。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新竹縣制度考》（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

嘉慶13年，昭應宮從創建之初「居民合建」，至嘉慶22年陳蒸主政時為「官民合建」，於官方介入後，住持之聘任也同臺灣其他官建寺廟，官府掌握主導權，如臺南大天后原為寧靖王（A.D. 1617-1683）宅邸，「康熙二十三年臺灣底定，神有效靈，靖海將軍侯施琅同諸鎮捐俸鼎建」，¹⁶ 當時聘任之住持僧為寄漚和尚，屬「臨濟橫支」，「授簡」（謂囑人寫作）於季麒光。¹⁷ 故昭應宮有僧人住持，最早當在嘉慶13年，最晚為嘉慶22年。

清代官廟特色之一，即是給予香燈資，如香燈田、渡船資等，昭應宮亦同，史載昭應宮：

香田在抵美福莊，年租穀二十八石；又本街西畔地基稅銀二十餘兩。西門外五結、東勢、二結、牛欄後及頭圍等處渡船，香燈銀共二十元、糧稅十六元、大船稅二十元，俱作香火之資；募僧住持（道光十四年改西向，規模較為宏敞）。¹⁸

昭應宮香燈資分為5類：香田、地基稅銀、渡船資、糧稅、大船稅，年收76餘兩，並「募僧住持」。

（二）「黃蘗流芳」牌位

昭應宮在嘉慶22年之前即聘有僧人，祖堂供奉兩方僧侶的牌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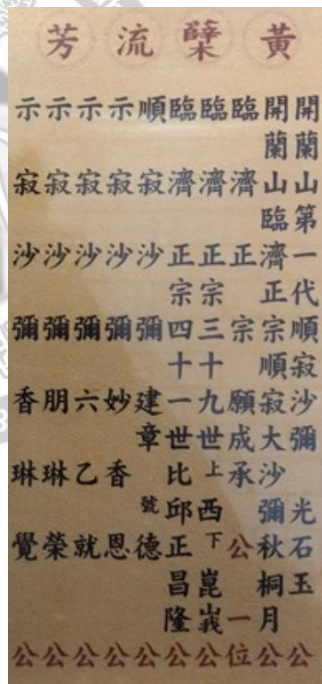
¹⁶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卷9〈外志·寺觀·附宮廟·天妃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219。

¹⁷ 闕正宗，〈清代治臺初期的佛教——以《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為中心〉，《佛光學報》新6卷第1期（2020年1月），頁264。

¹⁸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3中〈祀典·蘭中祠宇〉，頁118。

位，一方為「黃蘗流芳」，另一塊為「南院衍派」。宮廟所收香燈銀除了日常祭典開銷外，也做為僧人單銀。「黃蘗流芳」牌位（見圖1、圖2）供奉十位僧人法號如下：

開蘭第一代順寂沙彌光石玉公、開（蘭）山臨濟正宗
順寂大沙彌秋桐月公、臨濟正宗願成承公一位、臨濟
正宗三十九世^上西^下崑峨公、臨濟正宗四十一世比邱正
昌隆公、示（順）寂沙彌建章^號德公·妙香恩公·六
乙就公·明琳榮公·香琳覺公之蓮座。¹⁹



左圖1：宜蘭昭應宮「黃蘗流芳」牌位（資料來源：鍾旻融提供）

右圖2：宜蘭昭應宮「黃蘗流芳」牌位（資料來源：關正宗）

¹⁹ 參見圖1。

其中尤為注意的是「開蘭第一代」與「開山臨濟正宗」字樣，表示這兩位僧人是宜蘭首位僧人，以及昭應宮第一代住持。

清代噶瑪蘭廳的建置年代大體是嘉慶15年（A.D. 1810）奏請，嘉慶16年（A.D. 1811）10月批准，嘉慶17年（A.D. 1812）8月正式設官治理。²⁰ 也就是說，昭應宮聘請僧人住持無論是「開蘭第一代」與「開山臨濟正宗」，皆不會晚於嘉慶17年。

根據《黃檗山寺志·黃檗傳法法派》載〈明第一代黃檗開法圓悟密雲祖師源流法派〉為：「祖-道-戒-定-宗-方-廣-正-圓-通-行-超-明-實-際-了-達-悟-真-空」，〈清第四十代住持開法達光道暹禪師續立法派〉：「三-昧-原-無-相-一-秉-妙-厥-中-現-前-機-用-大-豁-露-本-來-衷」。²¹ 雖然達光道暹禪師（A.D. 1755-?）續立法派，但從道光4年續修的《黃檗山寺志》「第四十四代了馨清馥禪師」²² 來看，仍按圓悟密雲祖師（A.D. 1566-1642）源流法派傳承。

若從臨濟下22世（天台下15世）閩中雪峰祖定禪師演派二十字，接黃檗開法密雲圓悟派下，比較臺南大天后宮現存牌位：「第一代泉州開元當山示寂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主席黃檗四堂誌戴良準紫雲弘開戒法標大和尚蓮座」即黃檗山第14代住持良準明標，乃自臨濟下22世雪峰祖定禪師以後第34世，與牌位上之記載吻合。²³

²⁰ 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廳的建置〉，《宜蘭農工學報》第9卷（2002年12月），頁1。

²¹ 清·重興隆琦隱元祖師原本，性幽獨往等編訂續修，《黃檗山寺志》卷1，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84（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80-1994年），頁26。

²² 《黃檗山寺志》卷4，頁224。

²³ 闕正宗，《物華天寶話開元·開元寺傳承發展史》（臺南：開元寺，2010年），

若以臺南海會寺「示寂臺灣府僧綱司傳臨濟三十八世奕是如公壽塔」（參見圖3），此「奕是如公」，全稱為「奕是超如」，乃《黃檗山寺志·黃檗傳法法派》之「超」字輩，應為雪峰祖定禪師下臨濟第33世，²⁴ 高於良準明標一世，惟壽塔記為「傳臨濟三十八世」，有可能傳承其他臨濟宗演派亦未可知。



圖3：臺南海會寺奕是如公壽塔（資料來源：關正宗）

就昭應宮「黃蘗流芳」牌位的「臨濟正宗三十九世^上西^下崑峨」、「臨濟正宗四十一世比邱正昌隆」，從皆屬黃檗臨濟法脈來看，比對臺南海會寺「傳臨濟三十八世奕是如公壽塔」，落款時

頁67-68。

²⁴ 關正宗2010，頁67-68。

間為「嘉慶二十年乙亥桂月」，即知奕是超如圓寂於嘉慶20年（A.D. 1815）8月，其住持海會寺時間與昭應宮創建於嘉慶13年前後接近，從同來自黃檗山而言，若按臺南海會寺「示寂臺灣府僧綱司傳臨濟三十八世奕是如公壽塔」之輩派其演字應為「行（37）-超（38）-明（39）-實（40）-際（41）」中的「明」與「實」字輩，即「臨濟正宗三十九世上西下崑峨」及「臨濟正宗四十一世比邱正昌隆」，法號為「西崑明峨」與「正昌際隆」。

但若以《黃檗山寺志》演字「行（32）-超（33）-明（34）-實（35）-際（36）-了（37）-達（38）-悟（39）-真（40）-空（41）」，則臨濟正宗39世為「悟」字輩，41世為「空」字輩。故臨濟正宗三十九世上西下崑峨」及「臨濟正宗四十一世比邱正昌隆」，法號也有可能為「西崑悟峨」與「正昌空隆」。而臨濟宗41代，極可能是昭應宮最後黃檗法脈傳承，與臺南開元寺晚清傳至黃檗山臨濟宗40世的「真」字輩活動年代相若，約在咸豐年間。²⁵

無論如何，福建黃檗山的臨濟宗傳承於明鄭以降至清代嘉慶仍在臺灣南北衍傳，隨著福清縣黃檗山於道光後期再度毀於祝融，僧徒四散，有可能移錫海外臺灣，因此黃檗僧人出現在宜蘭並不為奇。

（三）南院衍派

除了福建黃檗山臨濟宗傳承外，昭應宮還有另一方「南院衍派」僧人牌位。「南院衍派」在臺灣多有所在，惟「南院」常被

²⁵ 闕正宗2010，頁76-77。

誤為漳州南山寺，如《大甲鎮瀾宮志》，²⁶ 甚至推定是至今仍無法確定的南少林。²⁷

漳州南山寺始建於唐，宋代初名「報劬院」，之後易名「崇福寺」，至明代方稱南山寺。²⁸ 宋代稱「南州法堀」的漳州南山寺，曾盛極一時，清末南山寺成為「喝雲派」之祖庭，惟2001年出版的《南山寺志》稱，晚明臨濟宗亘信行彌（A.D. 1603-1659）於主持南山寺後「南山寺也成為閩南著名道場，號稱臨濟宗喝雲派祖庭」，²⁹ 此說與「喝雲派」出現的時間頗有落差。

南山寺晚明傳承為亘信行彌之臨濟宗輩派，屬雪岩祖欽（A.D. 1216-1287）一脈，為楊岐（楊岐方會，A.D. 992-1050？）派下。根據研究，雪岩祖欽一脈傳至天童（密雲）圓悟（A.D. 1567-1642）順序為：

雪岩祖欽（A.D. 1218-1287）——高峰原妙（A.D. 1238-1295）——
中峰明本（A.D. 1263-1323）——元長無明（A.D. 1284-1357）——
萬峰時蔚（A.D. 1303-1381）——海舟普慈（A.D. 1355-1450）——
寶峰明瑄（A.D. ?-1473）——天奇本瑞（A.D. ?-1508）——
無聞明聰（A.D. ?-1543）——笑岩德寶（A.D. 1512-1581）——
禹門正傳（A.D. 1549-1614）——密雲圓悟（A.D. 1567-1642）——
費隱通容（A.D. 1593-1661）。³⁰

²⁶ 黃晨存，《大甲鎮瀾宮志（四冊）》（臺中：財團法人臺中縣大甲鎮瀾宮董事會，2005年），頁45。

²⁷ 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豐原慈濟宮志》（臺中：慈濟宮，2018年），頁98。

²⁸ 清·吳宜燮、黃惠等纂修，《龍溪縣志》收在《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第30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108。

²⁹ 《漳州南山寺志》（漳州：南山寺，2001年），頁7。

³⁰ 徐文明，《楊岐派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550-650。

無論是天童圓悟還是費隱通容，皆是雪岩祖欽一脈，其法脈衍傳自臨濟下22世（天台下15世）閩中雪峰祖定禪師，祖定所演二十字派為：「祖²²道²³戒²⁴定²⁵宗²⁶-方²⁷廣²⁸正²⁹圓³⁰通³¹-行³²超³³明³⁴實³⁵際³⁶-了³⁷達³⁸悟³⁹真⁴⁰空⁴¹」。³¹而亘信行彌為「行」字輩，屬臨濟三十二世，若依《五燈全書》算法，則為「南嶽下三十五世」。此一派與清代黃檗山演字一致。



圖4：大甲鎮瀾宮「南院西天中土歷代祖師生蓮之座」（資料來源：闕正宗）

形成於清代的「喝雲派」，據《南普陀寺志》內號演字為：「紹隆祖道・續聯宗芳・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

³¹ 清・守一重編，《宗教律諸宗演派》，《已續藏經》冊150，頁525上。

普通」，³² 在臨濟宗第25世，碧峰下第7世的突空智板禪師「智」之前加上「紹隆祖道·續聯宗芳」八字，考其來源相似者為臨濟下24世槩山妙隨禪師（生卒年不詳）演派28字：「妙繼宏傳正法眼·興從鑑覺慶維昌·微可印宗圓佛果·紹隆祖道續聯芳」。³³

從同為「南院」衍派的大甲鎮瀾宮供奉「南院西天中土歷代祖師生蓮之座」（參見圖4）的禪師名錄得知，鎮瀾宮曾有八代禪僧住持於此。

根據鎮瀾宮「南院西天中土歷代祖師生蓮之座」與「歷代和尚禪師忌神」所錄歷代祖師排序如〈表1〉所示。

〈表1〉大甲鎮瀾宮歷代祖師

代 別	法 號	忌 日
第一代（開山）	若清湛隱禪師	九月十七日
第二代	允立然禪師	五月二十日
	開瑞然禪師	十二月初四日
	佛恩然禪師	四月十五日
	佛曇然禪師	四月十九日
第三代	啟成法禪師	八月初四日
	啟傳法禪師	六月初一日
	啟志法禪師	八月初七日

³² 《南普陀寺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頁6。

³³ 《宗教律諸宗演派》，《叢續藏經》冊150，頁525下。另見闕正宗，〈五臺、峨嵋、普陀前後寺臨濟宗法〉，《明清時期漢傳佛教的移入》，《臺灣佛教通史》第一卷（臺北：財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2022年），頁139-155。

第四代	慈三 ^界 禪師 慈雲 ^界 禪師 慈帆 ^界 禪師 ³⁴	二月初五日 九月十七日 六月十六日
第五代	智華 ^方 禪師	七月初十日
第六代	淵霖 ^廣 禪師 生元 ^廣 禪師	十二月初六日
第七代	箕萊 ^嚴 禪師 淇滿 ^嚴 禪師	十一月初九日 十月十七日
第八代	覺定 庚鐘	
	比丘宗贊 ^界 通禪師 比丘碧河照禪師	六月初九日 四月初八日

（資料來源：大甲鎮瀾宮祖堂，凡□為筆者所加）

從〈表1〉可以得知，鎮瀾宮前幾代住持法號有相當的秩序性（譜名[內號]避諱省略錯誤所致），即：湛—然—法—界—方—廣—嚴，第二代「然」字有三位，第三代「法」字亦有三位，第四代「界」字有三位，第六代「廣」有兩位，第七代「嚴」字有兩位，這是只有燈譜才有的現象，考其輩派正是普陀後寺從突空智板下「通」字派接續演48字的燈譜：「湛然法界，方廣嚴宏，彌滿本覺，了悟心宗，惟靈廓徹，體用周隆，聞思修學，止觀常融，傳持妙理，繼古賢公，信解行證，月朗天中」³⁵，是從「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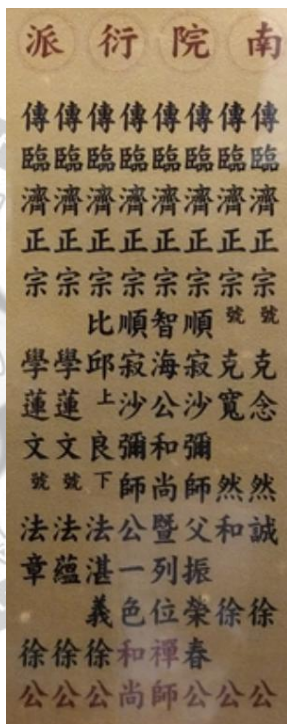
³⁴ 大甲鎮瀾宮志將「慈帆」誤植為「慈仇」。

³⁵ 《宗教律諸宗演派》，《卍續藏經》 冊150，頁526上。

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的「通」字普陀後寺（法雨寺）續演上述48字，而普陀前寺（普濟寺）則從「通」字續演32字：「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惟傳法印，證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紀祖宗」。³⁶



左圖5：宜蘭昭應宮「南院衍派」牌位（資料來源：鍾旻融提供）



右圖6：宜蘭昭應宮「南院衍派」牌位（資料來源：關正宗）

也就是說與宜蘭昭應宮同為「南院衍派」（參見圖5、圖6）的大甲鎮瀾宮，其稱之「南院」其實來自南海普陀山，並從《南山寺志》得知，漳州南山寺晚明傳承為亘信行彌之臨濟宗輩派，演字

³⁶ 《宗教律諸宗演派》，《叻續藏經》冊150，頁526上。

為「祖道戒定宗-方廣正圓通-行超明實際-了達悟真空」與黃檗山一致。

清代的「喝雲派」內號演字為：「紹隆祖道-續聯宗芳-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與大甲鎮瀾宮演字「湛然法界，方廣嚴宏」完全不同，更何況南山寺歷史上從未出現普陀後寺從突空智板之衍派，故可推知「南院」為「南海普陀山」之指稱。

〈表2〉昭應宮「南院衍派」僧人錄

宗派別	受戒別	字 號	俗 姓
臨濟正宗	—	克念然誠	徐
臨濟正宗	—	克寬然和	徐
臨濟正宗	順寂沙彌師父	振榮春公	—
臨濟正宗	—	智海公和尚暨列位禪師	—
臨濟正宗	順寂沙彌師公	一色和尚	—
臨濟正宗	比丘	良法湛義	徐
臨濟正宗	—	學蓮文法蘊	徐
臨濟正宗	—	學蓮文法章	徐

（資料來源：據宜蘭昭應宮「南院衍派」牌位製作）

昭應宮「南院衍派」僧人共八位，有五位俗姓徐，可能是同族親人，二位沙彌，比丘一位，其餘受戒別不明。從演字順序來看為「湛-然-法」三代師徒，與大甲鎮瀾宮「南院西天中土歷代祖師生蓮之座」支派輩同出一脈，屬普陀後寺從突空智板下「通」字派接續演48字的燈譜：「湛然法界，方廣嚴宏」。

另外，豐原慈濟宮「南院」僧人牌位，中間寫著「臨濟正宗開山祖師覺靈蓮座」，左右兩位僧人字號分別為「順寂沙彌^上善^下念湛公覺靈座」、「順寂沙彌^上意^下添然公覺靈座」，³⁷ 其演字有「湛-然」二字，正如前述，此乃普陀後寺突空智板支派輩字號別。再次證明「南院衍派」為南海普陀後寺之傳承，說明「南院」即指南海普陀山。

值得注意的是，豐原慈濟宮創建歷史不明，信史之一為鑄造於嘉慶6年（A.D. 1801）的銅鼎式香爐，以及嘉慶19年（A.D. 1814）正殿神龕前大案桌，³⁸ 表示善念湛公、意添然公兩位僧人活動時間為嘉慶年間，與昭應宮僧侶創建於嘉慶13年的「南院衍派」「湛-然-法」三代師徒活動時間相若。

浙江南海普陀山作為觀音道場，無論是漢傳佛教，或是民間信仰，皆知其為觀音「祖庭」，無獨有偶，無論是大甲鎮瀾宮、豐原慈濟宮，或是宜蘭昭應宮，主尊為媽祖，後殿奉觀音，聘僧侶住持，其臨濟宗派輩演字為南海普陀山後寺，皆稱「南院」，顯然所指涉者為南海普陀山，而非漳州南山寺。

昭應宮自1808年創建以來，至乙未割臺，凡88年，從「黃檗流芳」、「南院衍派」僧人合計18位，僧人住持時間先後順序來看應是黃檗山派為先，可佐證者為「黃檗流芳」牌位上刻有「開蘭第一代順寂沙彌光石玉公、開山臨濟正宗順寂沙彌秋桐月公」字樣。

加之嘉慶20年同為黃檗山派臨濟宗38代駐錫臺南開元寺僧綱司奕是超如（A.D. ?-1815）圓寂，時間與昭應宮臨濟宗39代西崑峨

³⁷ 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豐原慈濟宮志》，頁22。

³⁸ 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豐原慈濟宮志》，頁23。

接近，也與昭應宮創建時間接近。

1895年，進入日本殖民時期後，昭應宮住持應為雪凝和尚（A.D. 1896-1969），據報導，1914年4、5月間，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善慧法師（A.D. 1881-1945）偕知客德融（A.D. 1844-1977），以及宜蘭昭應宮住持黃雪凝到上海參觀佛教總會，「擬聯合諸方共行布教事宜」³⁹。同年5月24日，善慧、德融、雪凝南下鼓山湧泉寺，拜會鼓山方丈古月和尚（A.D. 1839-1919），在閩盤桓十餘天。⁴⁰ 應可確知，殖民初期昭應宮住持為雪凝和尚。

雪凝和尚生於清光緒22年（A.D. 1896），21、22歲時於鼓山湧泉寺出家，禮聖恩和尚（生平不詳）為師，1918年於中壢平鎮創建湧光堂。⁴¹ 1921年，雪凝和尚與弟子常達和尚（A.D. 1890-1968）被聘為桃園龜山石雲寺住持，當時雪凝和尚的頭銜為「日本曹洞宗49代開教使」。⁴² 故可知，最晚1918年，雪凝離開宜蘭，來到中壢平鎮創建湧光堂。

四、結語

昭應宮兩方牌位，透露許多宜蘭地區佛教史，從「黃檗流芳」牌位看，清代宜蘭首位僧人為「沙彌光石玉公」，而昭應宮開山

³⁹ 〈臺灣布教師來滬參觀佛教〉，《佛學叢報》第11期（1914年5月），頁4。

⁴⁰ 迺蘭生，〈旅閩隨錄〉，《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6月5日），6版。

⁴¹ 闕正宗，《臺灣佛寺導遊（四）·湧光寺》（臺北：菩提長青，1993年），頁7-10。

⁴² 闕正宗，《臺灣佛寺導遊（三）·石雲寺》（臺北：菩提長青，1991年），頁42。

為臨濟宗「沙彌秋桐月公」，之後迎來兩位受戒比丘，臨濟正宗三十九世^上西^下崑峨與臨濟正宗四十一世比丘正昌隆住持，至於其他五位僧人，可能是兩位比丘僧之徒弟、徒孫，初步判斷黃檗衍派約傳承五代。

「南院衍派」僧人雖有五人，但實為三代，其他三位未明派下者，也可能是南院同一時代僧人。從「黃檗流芳」、「南院衍派」兩方牌位僧人合計18位，大約傳承八代，昭應宮自嘉慶中葉（A.D. 1808）建寺後，至1895年，歷時88年，一任住持約10年。

從大甲鎮瀾宮、豐原慈濟宮、宜蘭昭應宮的「南院」僧人牌位字號顯示，為浙江南海普陀山普陀後寺之演字，而這三座寺廟主尊媽祖，後殿為觀音，作為觀音道場的南海普陀山，稱為「南院」也於理有據。加上僧侶活動年代相若，約在嘉慶年間，此一時間僧侶來臺並非少數，是否與乾隆39年（A.D. 1774）之後佛教政策的改變有關，需進一步研究。

清代宮廟十之八九有僧人牌位，隨著僧人牌位不斷出土，對於研究清代臺灣佛教，乃至民間信仰史，可說有極大的助益。而宜蘭昭應宮兩方牌位至少具有兩大意義：一者清代宜蘭有臨濟宗兩派分別傳自黃檗山與普陀山；二者清代臺灣佛教宗派以臨濟宗為主，且以閩東黃檗山及浙江南海普陀山為代表，閩南地區（漳州、泉州、廈門）佛教尚未得見。

引用文獻

一、史料文獻

1. 清·守一重編，《宗教律諸宗演派》，《乩續藏經》冊150。
2.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7〈祀典志·附考〉、〈祠廟志〉；卷8〈職官志·文秩·噶瑪蘭通判〉；卷10〈宦績志（附幕賓）〉，《臺灣文獻叢刊》第92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3.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4.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2中〈職官·官秩·噶瑪蘭通判〉；卷3中〈祀典·蘭中祠宇〉；卷8〈雜識下·駢體·天后宮上梁文 全卜年〉，《臺灣文獻叢刊》第160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5.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卷9〈外志·寺觀·附宮廟·天妃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6. 清·重興隆琦隱元祖師原本，性幽獨往等編訂續修，《黃檗山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84，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80-1994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論文集

1. 《南普陀寺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2. 《漳州南山寺志》，漳州：南山寺，2001年。
3. 徐文明，《楊歧派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4. 清·吳宜燮、黃惠等纂修，《龍溪縣志》收在《中國地方志集

- 成·福建府縣志輯》第30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5. 游謙、施芳瓏著，《宜蘭縣民間信仰》，宜蘭縣政府，2003年。
 6. 黃晨存，《大甲-鎮瀾宮志（四冊）》，臺中：財團法人台中縣大甲鎮瀾宮董事會，2005年。
 7. 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豐原慈濟宮志》，臺中：慈濟宮，2018年。
 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新竹縣制度考》，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9. 闕正宗，《物華天寶話開元·開元寺傳承發展史》，臺南：開元寺，2010年。
 10. 闕正宗，《臺灣佛寺導遊（三）·石雲寺》，臺北：菩提長青，1991年。
 11. 闕正宗，《臺灣佛寺導遊（四）·湧光寺》，臺北：菩提長青，1993年。

（二）期刊論文

1. 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廳的建置〉，《宜蘭農工學報》第9卷，2002年12月。
2. 鍾旻融，〈宜蘭昭應宮發展歷史之若干考証—從地方流傳的三則傳說談起〉，未刊稿。
3. 闕正宗，〈清代治臺初期的佛教—以《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為中心〉，《佛光學報》新6卷第1期，2020年1月。

（三）其他

1. 〈臺灣布教師來滬參觀佛教〉，《佛學叢報》第11期，1914年5

月。

2. 迺蘭生，〈旅閩隨錄〉，《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6月5日，6版。
3. 昭應宮正門石柱楹聯：2019年4月17日田調抄錄。



